

出版
文化出版社
花木蘭

曾永義
主編

輯刊 研究 文學 古典

八 編 第 19 冊

清代桐城派古文之研究(上)

陳桂雲 著



古典文獻研究輯刊

八 編

曾 永 義 主編

第 19 冊

清代桐城派古文之研究（上）

陳 桂 雲 著



國家圖書館出版品預行編目資料

清代桐城派古文之研究（上）／陳桂雲 著 — 初版 — 新北市：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2013〔民 102〕

目 6+180 面：19×26 公分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八編：第 19 冊）

ISBN：978-986-322-395-5（精裝）

1. 桐城派 2. 古文

820.8

102014688

ISBN-978-986-322-395-5



古典文學研究輯刊

八 編 第十九冊

ISBN：978-986-322-395-5

清代桐城派古文之研究（上）

作 者 陳桂雲

主 編 曾永義

總 編 輯 杜潔祥

出 版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所 花木蘭文化出版社

發 行 人 高小娟

聯絡地址 235 新北市中和區中安街七二號十三樓

電話：02-2923-1455／傳真：02-2923-1452

網 址 <http://www.huamulan.tw> 信箱 sut81518@gmail.com

印 刷 普羅文化出版廣告事業

初 版 2013 年 9 月

定 價 八編 24 冊（精裝）新台幣 42,000 元

版權所有・請勿翻印

清代桐城派古文之研究(上)

陳桂雲 著

作者簡介

陳桂雲，1957年生，台北市人，中國文化大學中國文學研究所博士，現職為國立故宮博物院圖書文獻處編審，並自1986年任中國文化大學兼任講師。主要研究領域為清代散文、唐代文學、民俗學。另有專著《楊妃故事之研究》，相關論著有〈宋 李公麟 麗人行〉、〈艷質豐肌說楊妃〉、〈《論語》中顏回形象的現代闡釋〉、〈清宮的年貨大街〉等。

提 要

清代桐城派具有「冠蓋滿京華，文章甲天下」的美譽，於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褒貶不一，仁智互見；就文學觀點而言，實則有回顧與重新檢視之價值。本研究專事於探討桐城派代表作家的文論體系與創作，對桐城派之緣起、師承、傳衍、發展、遞變與式微進行系統性之考察及闡述。

首先廣蒐先驅戴名世、桐城三祖、湘鄉派曾國藩、陽湖派張惠言、惲敬等諸家之論著為研究之基礎資料，再旁徵其門人弟子之論述，及廣引後世文人之相關著作，以為佐證。除古籍之探索，亦採輯清國史館所留之豐碩清人傳記資料，及民國以來的大量研究結果，分別加以評述、歸納與比較分析。研究中各論點均採專題討論方式深入剖析，並涵蓋彼此間之密切關聯性。

同時，亦從回顧中國歷代古文開始，勾劃古文體裁發展軌跡的轉變歷程，以探本溯源；次則梳理桐城文派之發展過程與諸家文論，取「其言論足以支配一代者」予以評析，並釐清其間繼承發展的關係脈絡，及其特色所在；再次則剖析桐城派學術思潮的演進，及其對西學東漸之態度和貢獻；末則探究桐城文學之書院傳播及其論著之精要。希冀客觀而準確地檢視桐城派古文的起伏、變遷，及其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給予系統性的正確認識與評價。



目 次

上 冊

第一章 緒 論	1
第一節 桐城派古文研究之動機、目的、範圍與方法	1
一、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1
二、研究之範圍與方法	1
第二節 桐城派古文之界義	2
一、「古文」之定義	2
二、「桐城派」之得名	6
三、「桐城派古文」釋義	8
第三節 前人研究成果述要（1908～2008）	9
一、偏激抨擊與全盤否定：20 年代前期	10
二、客觀與理性的評價：20 年代後期	11
三、有系統的探討：30 年代末開始	13
四、褒貶兩極，爭論不休：50～70 年代	17
五、揭開創新研究的序幕：70 年代以後	20
六、多元化角度進入專題研究之高峰：90 年代以後	22
七、近 20 年來，桐城派研究的幾個重要方向	25
八、前人研究重點分析	31

第四節 尚待研究之方向	34
第二章 桐城派古文成立背景	37
第一節 擷取先秦兩漢散文優良傳統	37
一、先秦時期（B.C 246 以前）	37
二、兩漢時期（B.C 206～A.D 220）	40
三、東漢散文各體大致齊備	44
第二節 承繼唐宋古文運動餘波	44
一、唐代古文運動的先驅	45
二、中唐古文運動開端及領導者——韓愈、 柳宗元	48
三、韓柳的古文理論	53
四、韓柳對古文運動的貢獻	61
五、北宋古文運動的醞釀	64
六、北宋古文運動的完成	74
第三節 發揚明代唐宋派的精神	88
一、明代初期文風	88
二、明代中葉復古運動	89
三、晚明時期諸派競起	93
四、清初時期啓桐城派之端緒	95
第三章 桐城派的古文家及其古文創作	119
第一節 康乾盛世之桐城三祖	119
一、桐城派創始者——方苞	120
二、桐城派中繼者——劉大櫟	125
三、桐城派集大成者——姚鼐	128
第二節 清中期之姚門五大弟子	130
一、鴉片戰爭之前夕	130
二、劉 開	133
三、管 同	136
四、方東樹	137
五、姚 瑩	139
六、梅曾亮	143
第三節 清末民初之桐城後期諸子	145
一、風雨西潮	145

二、嚴復	148
三、林紓	151
四、姚永樸	154
第四節 桐城派古文旁支——清中後期之陽湖派	154
一、陽湖派之崛起	154
二、乾嘉時期之陽湖二祖	158
三、陽湖後學	163
第五節 桐城派古文之流行——湘鄉派之中興	166
一、曾國藩	167
二、張裕釗	170
三、薛福成	172
四、黎庶昌	175
五、吳汝綸	177

下 冊

第四章 桐城派的古文理論	181
第一節 桐城派之興起	181
一、時代背景與文壇風尚	181
二、地域環境	189
第二節 桐城三祖之古文理論	190
一、方苞「義法」、「雅潔」說	190
二、劉大櫟神氣說	198
三、姚鼐集大成	209
第三節 在承襲中尋求突破的姚門弟子	216
一、劉開	216
二、管同	220
三、方東樹	223
四、姚瑩	231
五、梅曾亮	231
第四節 桐城後期三子之古文理論	236
一、嚴復	236
二、林紓	237
三、姚永樸	243

第五節 陽湖派古文理論	247
一、張惠言	247
二、惲敬	250
三、陸繼輅	261
四、李兆洛	262
五、陽湖派與桐城派之相異處	265
第六節 湘鄉派古文理論	267
一、曾國藩	267
二、張裕釗	272
三、薛福成	274
四、黎庶昌	276
五、吳汝綸	277
六、湘鄉派與桐城派之相異處	279
第七節 桐城派古文理論之優缺與毀譽	280
一、古文理論的優點	281
二、古文理論的缺點	282
三、民初對桐城派之抨擊聲浪	283
四、對於桐城派古文之毀譽	296
第五章 桐城派學術思潮的演進	303
第一節 與傳統學術之激盪	303
一、桐城文學與漢宋學	303
二、桐城文學與時文——時文與古文相濟爲用	311
三、桐城文學與駢文——駢散相成	313
第二節 對西學東漸之態度及其貢獻	314
一、西學傳播之途徑	314
二、出使見聞之實錄——中西對比下的思索	316
三、西方學術之譯介	324
第六章 桐城文學之選集與論著	329
第一節 桐城文學選集	329
一、姚鼐《古文辭類纂》	330
二、曾國藩《經史百家雜鈔》	334
三、王先謙《續古文辭類纂》	336

四、黎庶昌《續古文辭類纂》	336
第二節 桐城文學理論總述	337
一、林紓《春覺齋論文》	337
二、姚永樸《文學研究法》	338
第七章 桐城派之書院傳播與影響	341
第一節 桐城派之書院講學風潮	341
一、南方各省桐城文學流行之奠基者——姚鼎	342
二、遍及全國桐城文學風潮之帶領者——梅曾亮	344
三、河北古文、新式教育之提倡地——蓮池書院	350
第二節 桐城派之影響	352
一、對時代文風的影響	352
二、對古文理論的影響——建立完整的古文理論體系	355
三、對文化學術的影響	357
第八章 結 論	361
一、對桐城派的總體評價	361
二、桐城派在文學史上的地位	364
三、本論文研究結果	365
徵引書目	371
附 錄	389
附錄一：桐城派流變圖	391
附錄二：桐城派代表性人物之圖像	392
附錄三：桐城派古文名家之書影	397
附錄四：文獻檔案書影	410
附錄五：桐城派重要作家傳略表	424
附錄六：桐城派代表性人物之重要著作	430
附錄七：桐城派重要作家之古文名作	431
附錄八：文體分類表	442
附錄九：清朝歷史紀元表	443

第一章 緒 論

第一節 桐城派古文研究之動機、目的、範圍與方法

一、研究之動機與目的

清代（1644～1911）文壇中「桐城派」是中國文學史上綿延最久，影響最廣，聲勢最爲壯觀的一個散文流派；源於康乾（1662～1795），盛於嘉道（1796～1850），漫於同光（1862～1874），至民初五四時期才漸至消聲匿跡。考桐城古文之流衍，自乾隆（1736～1795）末年，桐城文派得名之始，至民初新文學運動興起，以白話文取而代之爲止，幾與滿清國祚相終始，足足盛行二百餘年。〔註1〕於中國文學發展史中，評價不一，仁智互見，褒者讚以「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註2〕，貶者譏以「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註3〕，看法不一。針對前人對桐城派評價褒貶兩極之詭譎現象，實可重新回顧與檢視。

二、研究之範圍與方法

本文取桐城三祖方苞（1668～1749）、劉大櫟（1698～1780）、姚鼐（1731

〔註1〕自桐城派先驅戴名世（1653～1713）生活的康熙年間（1662～1722）算起，至桐城後進馬其昶、林紓、姚永樸、姚永概等人活動的1930年止，約二百餘年，期間桐城文論及創作影響盛大，無論是各大學術流派或文人名士，都或多或少地與之產生互動。

〔註2〕據姚鼐《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所載，程晉芳、周永年曾有此讚語。

〔註3〕錢玄同云：「唯選學妖孽，桐城謬種，見此又不知若何咒罵。」詳見錢玄同：《通信欄》，《新青年》第3卷第1號（1917年）。

～1815)；陽湖二祖張惠言(1761～1802)、惲敬(1757～1817)；湘鄉派創立者曾國藩(1811～1872)等諸家論著爲首要資料，旁徵其弟子後學，復參酌民國以來前賢研究之成果，以資借鑑攻錯。除古籍之探索，亦採輯豐碩之清人傳記資料「傳包」、「傳稿」〔註4〕，及民國以來的大量研究結果，加以評述、歸納、比較分析。每章均採專題討論方式深入剖析，彼此密切關聯，首先從回顧歷代古文開始，勾劃古文體裁發展軌跡的轉變歷程；次則敘及桐城、陽湖、湘鄉三派之興起與諸家文論，期能釐清「桐城文學」〔註5〕之流變軌跡及其特色所在；接著探究桐城派、陽湖派、湘鄉派之文論，以考其微旨；次則剖析桐城文學於演進時，與其他文體、學術，甚至是西方文化間，相互交流激盪所產生之變化；再則述及桐城文學之傳播過程，與桐城文學選集、桐城文學理論總述之精要，作一梗概之介紹；末則就桐城派之影響、評價作一概要的總結，刪其冗蕪，取其精當者，以爲論證。本文力圖還原桐城諸子之本來面貌，將桐城諸家「義法」和古文創作成就，進行精審深入分析，給予正確之認識和評價，希冀客觀準確地檢視桐城派古文之起伏、變遷及在中國文學史上的地位。

第二節 桐城派古文之界義

一、「古文」之定義

(一) 先秦典籍

「古文」二字首見於《史記》，司馬遷於書中屢屢提及，如《史記·五帝本紀》曰：

學者多稱五帝，尚矣！然《尚書》獨載堯以來，而百家言黃帝，其文不雅馴，薦紳先生難言之。孔子所傳宰予問五帝德，及帝繫姓，

〔註4〕 所謂「傳包」，是清國史館爲纂修人物列傳，咨取蒐集之各種傳記資料，以人爲單位各自歸納成包，故稱「傳包」。所謂「傳稿」，是史官修傳所留下之稿本，因非進呈定本，故統稱爲「傳稿」。爲國立故宮博物院所珍藏，是清人研究之第一手資料。詳細說明請參閱本論文之附錄四。

〔註5〕 本論文所謂的桐城文學，係指包含桐城、陽湖、湘鄉三派的文論與創作。陽湖、湘鄉自得名之始，即被視爲桐城別支，尤其自民國以來的研究更是如此；然因其創始者實無創派之念，文學主張亦皆以桐城文論爲基礎所加以改造者，是以其文學實可綜而觀之。

儒者或不傳。余嘗西至空峒，北過涿鹿，東漸於海，南浮江淮矣。至長老皆各往往稱黃帝、堯、舜之處，風教固殊焉。總之不離古文者近是。〔註6〕

唐、司馬貞《史記索隱》注曰：「古文即《帝德》、《帝系》二書也，近是聖人之說。」〔註7〕

又如《史記·封禪書》曰：「羣儒既已不能辨明封禪事，又牽拘於《詩》、《書》古文而不能騁」〔註8〕；《史記·吳太伯世家》曰：「太史公曰：『孔子言「太伯可謂至德矣，三以天下讓，民無得而稱焉。」余讀《春秋》古文，乃知中國之虞與荊蠻句吳，兄弟也』」〔註9〕；《史記·太史公自序》曰：「遷生龍門，耕牧河山之陽。年十歲，則誦古文。」〔註10〕司馬貞《史記索隱》注曰：「遷及事伏生，是學誦古文《尚書》。劉氏以爲《左傳》、《國語》、《系本》等書，是亦名之古文也。」〔註11〕

諸如此者凡數見，而其所言之《帝德》、《帝系》、《尚書》、《詩經》、《春秋》、《左傳》、《國語》等，皆爲古之經籍，是以「古文」定義之一，即泛指先秦典籍而言。

（二）漢之古文經傳

自秦始皇焚書坑儒後，經傳之傳播受到嚴重之影響。入漢後，少數耆老將其記憶中之經書內容背誦而出，並以當時通行之隸書抄記。景帝時，河間獻王在民間以重金徵集古文經傳，《漢書·景十三王傳》曰：「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皆經傳說記，七十子之徒所論，其學舉六藝，立毛氏《詩》，《左氏春秋》博

〔註6〕〔漢〕司馬遷：《史記》（臺北：文馨出版社，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1975年10月），卷1，頁40。

〔註7〕〔漢〕司馬遷：《史記》（臺北：文馨出版社，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1975年10月），卷1，頁40～41。

〔註8〕〔漢〕司馬遷：《史記》（臺北：文馨出版社，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1975年10月），卷28，頁552。

〔註9〕〔漢〕司馬遷：《史記》（臺北：文馨出版社，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1975年10月），卷31，頁581。

〔註10〕〔漢〕司馬遷：《史記》（臺北：文馨出版社，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1975年10月），卷130，頁1350。

〔註11〕〔漢〕司馬遷：《史記》（臺北：文馨出版社，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1975年10月），卷130，頁1350。

士。」〔註12〕

武帝時，魯恭王又發現孔壁藏書。《漢書·藝文志》曰：「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廣其宮，而得古文《尚書》，及《禮記》、《論語》、《孝經》，凡數十篇，皆古文也。」〔註13〕兩王先後獻予朝廷，藏於秘府。自此為有所分別，便將漢初口誦筆錄之經傳稱為今文；而河間獻王、魯恭王所得之經籍稱為古文。

今文與古文經籍，起先僅有字體今古之分，後擴及篇章文字異同之考校，與經籍真偽之爭端，雙方各有擁護之儒者，而衍為學派之對立，形成今古文經學之爭。經書之解趨於分歧，如《史記·儒林列傳》曰：「自此之後，魯周霸、孔安國，雒陽賈嘉，頗能言《尚書》事。孔氏有古文《尚書》，而安國以今文讀之，因以起其家。逸書得十餘篇，蓋《尚書》滋多於是矣。」〔註14〕又如《漢書·藝文志》曰：「劉向以中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脫去無咎、悔亡，唯費氏經與古文同」〔註15〕；《漢書·楚元王傳·劉歆》曰：「及歆校秘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歆大好之。」〔註16〕雙方勢必互相排斥，而形成今古文經學學派之爭；是以「古文」定義之一，即指漢代所出之古文經傳。

（三）古文字

文字傳說為倉頡所造，此後字體不斷演進。《說文解字》曰：

倉頡之初作書，蓋依類象形，故謂之文，其後形聲相益，即謂之字。……及宣王太史籀著大篆十五篇，與古文或異。至孔子書六經，左丘明述春秋傳，皆以古文，厥意可得而說。其後諸侯力政，不統於王，……言語異聲，文字異形。秦始皇帝初兼天下，丞相李斯乃奏同之，罷其不與秦文合者，斯作倉頡篇，中車府令趙高作爰歷篇，大史令胡毋敬作博學篇，皆取史籀大篆，或頗省改，所謂小篆者也。是時秦燒滅經書，滌除舊典，大發隸卒，興役戍，官獄職務繁，初有隸書，以趣約易，而古文由此絕矣。……及亡新居攝，

〔註12〕〔漢〕班固：《漢書》（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卷53，頁807。

〔註13〕〔漢〕班固：《漢書》（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卷30，頁513。

〔註14〕〔漢〕司馬遷：《史記》（臺北：文馨出版社，影印清乾隆武英殿刊本，1975年10月），卷121，頁1277。

〔註15〕〔漢〕班固：《漢書》（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卷30，頁512。

〔註16〕〔漢〕班固：《漢書》（清乾隆四年武英殿刻本），卷36，頁618。

使大司空甄豐等校文書之部，自以爲應制作，頗改定古文。時有六書，一曰古文，孔子壁中書也；二曰奇字，即古文而異者也；三曰篆書，即小篆，秦始皇使下杜人程邈所作也；四曰佐書，即秦隸書；五曰繆篆，所以摹印也；六曰鳥蟲書，所以書幡信也。〔註17〕

許慎（約58～147）以古文與大篆、奇字、小篆、秦隸書、繆篆、鳥蟲書等字體對舉而論。所謂古文，乃指孔壁藏書所使用之文字，其形若蝌蚪，故又稱蝌蚪文。

此外，若以後世廣行之字體而論，則又有今古文字之別。如漢魏本以篆隸文爲正體，至唐改以楷書代之，焦竑（1540～1620）《焦氏筆乘》曰：「古文更作楷書，以便習讀，而俗書始雜之。」〔註18〕即視楷書爲今文，在此前之文字皆爲古文，乃依時代先後而分；是以「古文」定義之一，即指文字之古。

（四）與駢文相對待之散體文

就文體而言，中國傳統文學體裁原先並無界定，後因文學發展愈發興盛，寫作手法愈趨精細，而逐漸有所劃分。舉例來說，散文原先包含韻文與散體文，自先秦至西漢初期，兩者渾爲一體，無甚分別。此後因韻文專尚追求駢儷的表現技巧，而被稱爲駢文。西晉時，已有完整的駢文作品出現；而魏晉六朝以後，駢文逐漸成爲文壇的流行文體，偏重於以聲律、辭藻、及形式之華美，文風趨於浮豔綺靡。

中唐、韓愈（768～824）爲革此弊，遂提出「古文」一詞，以與駢文區別。他在〈題歐陽生哀辭後〉一文曰：「愈之爲古文，豈獨取其句讀不類於今者邪？思古人而不得見，學古道則欲兼通其辭。通其辭者，本志乎古道者也。」〔註19〕足見得句讀不類於駢儷之文，本是古文形式上先決之點。他主張上繼三代兩漢文體的散文，以復古爲口號，文以載道爲文章思想內涵，以闡明儒道的基本宗旨，並與駢文相抗，以期恢復散文的文學主導地位；是以「古文」定義之一，即指與駢文相對待之散體文。

古文之名自《史記》初用以來，義雖有四，然至韓愈推動「古文」運動

〔註17〕〔漢〕許慎：《說文解字·上》（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四部叢刊》影印清同治本），卷15，頁227～228。

〔註18〕〔明〕焦竑：《焦氏筆乘》（明萬曆三十四年刻本），卷4，頁55。

〔註19〕〔唐〕韓愈：〈題歐陽生哀辭後〉，收入〔清〕董誥輯：《全唐文》（清嘉慶內府刻本），卷567，頁5728。

起，文學體裁之古文，即專指散體文而言。要言之，「對駢文之形式而言，則稱散文，對駢文之精神而言，則稱古文。」〔註20〕

二、「桐城派」之得名

「桐城」本為地名，經由戴名世（1653～1713）、方苞、劉大櫟、姚鼐等文學家間之相互啓發與推衍，逐漸形成新的古文派別。由於他們的祖籍皆為安徽桐城，因而得名。姚鼐為業師賀壽，恭撰〈劉海峰先生八十壽序〉文中曰：

曩者鼐在京師，歛程吏部、歷城周編修語曰：「為文章者有所法而後能，有所變而後大。維盛清治邁逾前古千百，獨士能為古文者未廣。

昔有方侍郎，今有劉先生，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註21〕

程吏部即程晉芳（1718～1784），原名廷鑑，字魚門，號戢園，原籍安徽歙縣，江蘇江都人。乾隆三十六年（1771）進士，補吏部主事。周編修即周永年（1730～1791），字書昌，號林汲山人，山東歷城人，與程晉芳為同科進士，授翰林院庶吉士。二人與姚鼐相交於共修《四庫全書》時。〔註22〕程、周之語意指清代中葉以前，文壇上古文能者稀少，只有方苞、劉大櫟前後交相輝映。由於程晉芳曾師從劉大櫟受古文法，有相同文學的傾向，尚有這樣說的可能；然周永年與桐城古文毫無關聯，怎會下此評語呢？足見當時桐城派之文論與創作，已形成一股不小的文學風潮；因此，周永年與程晉芳才會認為「天下文章，其出於桐城乎？」姚鼐則以山川鍾秀之說，加強這一結論。〔註23〕

〔註20〕方孝岳：《中國散文概論》，收入劉麟生、方孝岳等著：《中國文學七論》（桂林：廣西大學出版社，2007年1月），頁64。

〔註21〕〔清〕姚鼐：《惜抱軒詩文集·文集》（清嘉慶十二年刻本），卷8，頁59。

〔註22〕據乾隆三十八年（1773）閏3月11日〈辦理四庫全書處奏遵旨酌議排纂四庫全書應行事折〉云：「查有郎中姚鼐，主事程晉芳、任大椿，學政汪如藻，原任學士降調候補之翁芳綱，亦皆留心典籍，見聞頗廣，應請添派為纂修官，令其在館一同校閱，悉心考核，方足敷用。又查有進士余集、邵晉涵、周永年，舉人戴震、楊昌霖，於古書原委亦能多識，應請旨行文來京，在分校上行走，更足資集思廣益之用。」詳見〈辦理四庫全書處奏遵旨酌議排纂四庫全書應行事折〉，收入中國第一歷史檔案館編：《纂修四庫全書檔案（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7年7月），頁77。

〔註23〕王達敏云：「這場三人談盛稱方、劉，預言了桐城之學的崛起，桐城文系的雛型初露。」詳見王達敏：《姚鼐與乾嘉學派》（北京：學苑出版社，2007年11月），頁103～104。

以派稱桐城者，始於曾國藩〈歐陽生文集序〉曰：「歷城周永年書昌爲之語曰：『天下之文章，其在桐城乎？』由是學者多歸嚮桐城，號『桐城派』。」

〔註24〕自此士子相互傳述，桐城派遂成定名。

但不少桐城文人皆反對以「派」來稱謂。因爲以派別論，便有所界定與限制，無法隨意發揮；且學說勢必愈趨瑣細，區別愈趨分明，而無法全面探究其繼承與超越之處。林紓（1852～1924）爲其代表，〈與姚叔節書〉曰：「桐城之派，非惜抱先生所自立，後人尊惜抱爲正宗，未敢他逸而外軼，轉轉相承而姚派以立。僕生平未嘗言派，而服膺惜抱者，正以取徑端而立言正。」

〔註25〕某種程度上，不得不承認林紓的見解。因爲桐城以派別分述，文壇陸續出現陽湖、湘鄉之名；就其文統而言，實際上皆屬於桐城文學的一部分，單憑其師承、祖籍來判斷其隸屬何派是不足的。舉例來說，吳汝綸（1840～1903）在未進曾國藩幕府前，恪守桐城義法；後經曾國藩授以文論後，改爲傾向湘鄉，是以學界有言其爲桐城者，亦有言其爲湘鄉者。部分學者認爲湘鄉爲桐城之中興，言湘鄉即爲桐城，但這樣就正如林紓所擔憂的，學者往往陷於劃分派別之窠臼，而無法靜心去思辨其演進。〔註26〕

然而率先號爲桐城派的曾國藩，本身並未有意另立旁支，他一直以振桐城餘緒爲努力目標；考其文論，也確實是繼承桐城諸家之說以推衍。此外，「派」字蘊含著流衍、支流之意，因此，無論將湘鄉與桐城合論或分述皆可，端視爲文者之需求決定。本論文採取分章別述的方式，以「桐城派」單指桐城；「桐城」者則泛指桐城派、陽湖派、湘鄉派；並著重於古文理論方面的系統研究，以便觀其堂奧，評其得失，期能將桐城派古文作具體深入之探討及全面性之理解，無使後學者僅見其一隅之失。

桐城派順應清廷的文化政策，集我國歷代古文文論、創作之大成，試圖提出全新的主張，營造屬於當代以致於個人的獨特風格。他們所繼承者，主要是唐宋八大家的中心思想，如反對駢文、文以載道、辭必己出等，同時也繼承他們復古、創新兼具與關注體現現實的精神。

〔註24〕〔清〕曾國藩：《曾文正公詩文集（上）》，收入《國學基本叢書四百種》（臺北：臺灣商務印書館，1968年），卷1，頁81。

〔註25〕〔清〕林紓：《畏廬續集》，收入《畏廬論文等三種》（臺北：文津出版社，1978年影印本），頁17。

〔註26〕如晚清之馬其昶、嚴復、林紓等人，有言爲湘鄉者，有言爲桐城者，只能就其後期表現偏重何派之主張來加以論定。